

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

再现抗战文艺光辉

“烽火艺魂——中国艺术研究院抗战文艺典藏展”在京开幕

雪晓楠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、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承办的“烽火艺魂——中国艺术研究院抗战文艺典藏展”于7月16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幕。

本次展览分设“战歌震山河”“兰台唱金戈”“刀笔砺丰碑”三大展区,共展出140余件(套)抗战时期音乐、戏曲与美术领域的珍贵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。展览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深情回望,对英烈先辈的崇高礼敬,更是对抗战精神的时代诠释与薪火相传。

“战歌震山河”展区陈列有冼星海多件创作手稿、日记及其使用的钢笔、小提琴、钢琴等珍贵遗物,以及聂耳《扬子江的暴风雨》手稿和郑律成《八路军进行曲》、任光《渔光曲》的录音资料等。其中还特别展出了2003年入选第二批“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”的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手稿——1939年“延安稿”与1941年“莫斯科稿”。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璀璨明珠,《黄河大合唱》以母亲河黄河为喻,追溯民族辉煌历史,以恢宏气势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不屈,它既是音乐的华彩乐章,又是历史的生动注脚、革命的嘹亮回声,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深刻的纪念价值。

“兰台唱金戈”展区聚焦梅兰芳“蓄须明志”的铮铮风骨,展出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梅兰芳录制的《生死恨》《抗金兵》唱片,以及一系列抗战期间的演剧文献实物。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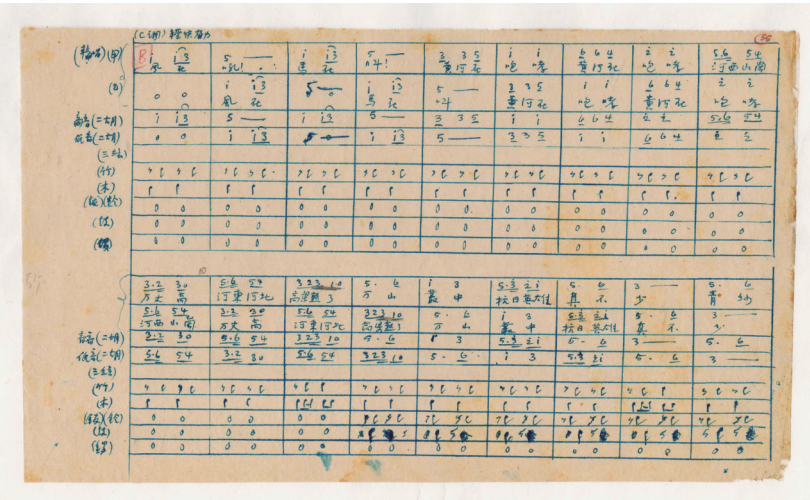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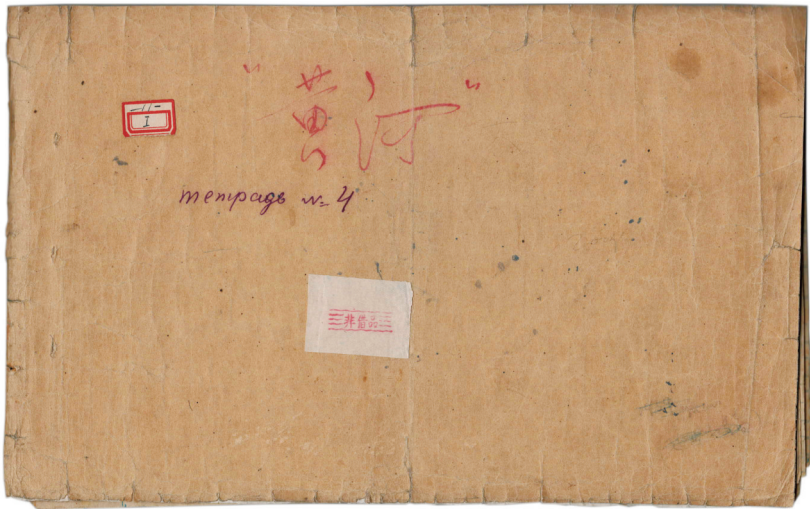
“烽火艺魂——中国艺术研究院抗战文艺典藏展”展厅

战期间,戏剧艺术家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他们不仅组织筹款义演为抗战募集资金,更通过戏剧创作和演出表达对前线将士的声援。第一舞台1932年2月29日戏单,就是他们慰劳抗日将士举办筹款义务夜戏的重要见证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,艺术家们以舞台为后方阵地,用戏剧的力量激发民族精神,鼓舞民众斗志,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。

“刀笔砺丰碑”展区集中呈现了沃渣、力群、彦涵、王琦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工作者对“为社会而艺术”文艺理念的践行,与其他书画、雕塑作品一起真实记录了军民抗战的情景以及

人民生活的场景。梅兰芳的《墨梅》暗喻高洁不屈,齐白石的《保民道国联》饱含家国之忧。他们的作品虽未直绘烽烟,却在静观与寓意之间凝聚着深沉的时代情怀与民族气节。铜塑为铭,雕塑家滑田友、刘开渠等以金石之坚,把中华民族在血火中淬炼出的不屈脊梁,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,成为民族精神的不朽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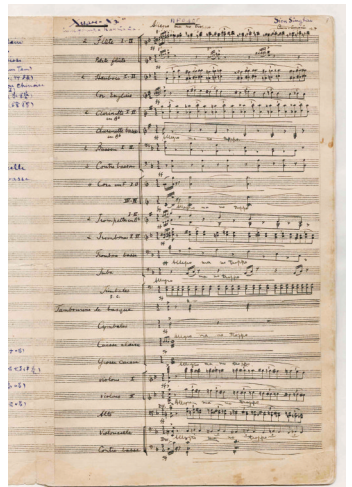
抚今追昔,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,这些熠熠生辉的抗战文艺典藏,激励我们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,坚守人民立场,坚定文化自信,不断书写新时代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时代放歌的壮丽篇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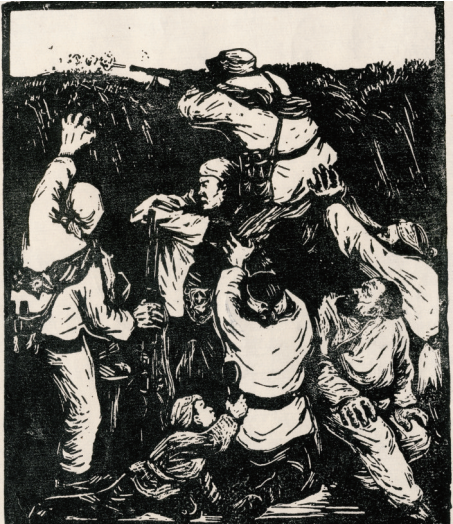
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手稿 1939年



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手稿 1941年



第一舞台 1932年2月29日戏单



彦涵木版画《当敌人搜山的时候》1943年



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排练《黄河大合唱》



沃渣木版画《卢沟桥抗战》1937年

唐弢与《两地书》

姚明

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,唐弢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、独特的文献视角、与鲁迅的密切交往,成为值得关注的人物。作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学者,唐弢的学术生涯始终与文本的校勘、史料、钩沉紧密相连。其中,他对鲁迅与许广平《两地书》的校勘工作,不仅体现了其文献考辨的严谨态度,更折射出他丰富的藏书体系、与鲁迅的精神对话以及书话文体的文学史价值。

与藏书:文献基石与校勘实践

唐弢藏书体系以新文学初版本、毛边本及珍稀期刊为核心,数量达4万余册。这一收藏体系不仅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,更直接服务于他的校勘实践。20世纪30年代,唐弢在上海废纸收购站抢救新文学文献的经历,使其对文本的版本流变尤为敏感。这种敏感性在《两地书》的校勘中得以充分体现。

《两地书》作为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至1927年的通信集,经鲁迅1932年删改后出版,与原信存在显著差异。20世纪50年代,唐弢偶然得见原信手稿,发现鲁迅对文本进行了去政治化、去隐私化的处理。为还原历史原貌,唐弢依托其收藏的1933年初版本、原信抄本及相关报刊,逐字校勘,最终完成《鲁迅全集补遗》及《续编》,补入鲁迅佚文100余篇,其中《两地书》相关校注达数万字。这一工作不仅修正了通行版本的讹误,更揭示了鲁迅在情感与公共话语间的复杂张力。例如,原信中鲁迅对高长虹等文学青年的批判语气较为尖锐,而在公开出版的《两地书》中,这些内容被大幅弱化。唐弢的校勘表明,鲁迅的文本修改并非简单的文字润色,而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策略性选择。

唐弢的藏书实践与校勘工作互为表里。他收藏的《老张的哲学》初版、鲁迅手稿《野草》等珍本,为其提供了版本对比的实物依据;而他对新文学书刊的系统性搜集,则构建了理解《两地书》时代语境的立体网络。这种以藏书支撑学术的路径,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实证传统的形成,至今仍为学界所重。

与鲁迅:私淑弟子的精神对话

唐弢与鲁迅的交往始于20世纪30年代,虽未正式师从却以“私淑弟子”的身份深度参与鲁迅文本的整理与研究。1934年,二人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编辑黎烈文的宴会上初次会面。鲁迅对其杂文风格的赞许,“唐先生写文章,我替你挨骂”,既是对唐弢文风的认可,也暗含对其思想立场的肯定。此后,唐弢在鲁迅指导下研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,并受托保护鲁迅在北平的藏书,这一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。

在《两地书》研究中,唐弢尤为关注鲁迅的“牺牲观”与矛盾心态。通过对比原信与修订本,他发现鲁迅在公开文本中刻意淡化了对“青年必胜于老年”进化论的反思。例如,原信中鲁迅直言某些青年“动辄反噬”,而《两

地书》中则改为对青年群体的辩证分析。唐弢指出,这一修改并非鲁迅思想的“衰退”,而是其“梯子之论”的延续,以自身为梯供青年踩踏,同时警惕被利用的困境。这一论断打破了既往研究中将鲁迅思想简化为“进化论到阶级论”的线性叙事,凸显其思想的复杂性与动态性。

唐弢对鲁迅的解读,始终带有亲历者的在场感。他亲赴北平阻止朱安出售鲁迅藏书,目睹周作人对鲁迅遗物的态度,由此深化了对鲁迅家庭悲剧的理解。这种情感共鸣使其在《两地书》校注中,既能客观分析文本差异,又能体察鲁迅在公私领域间的挣扎。如鲁迅在致许广平原信中坦言“我可以爱”的勇气,在公开版本中被修饰为更隐晦的表达,唐弢将此解读为鲁迅对传统伦理与革命话语的双重妥协。

与书话:文体创新与文学史重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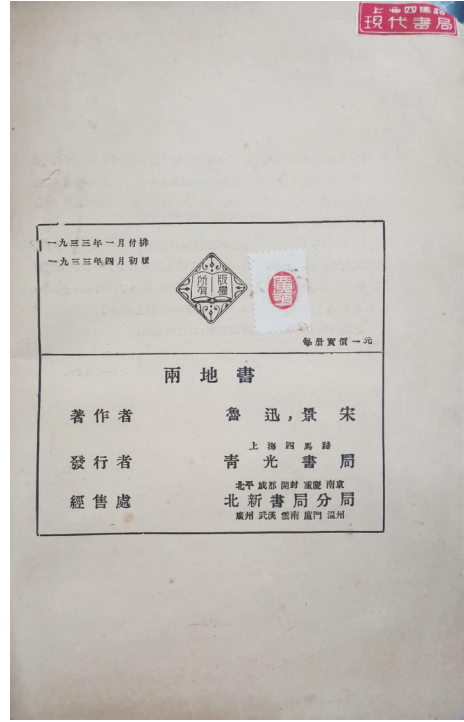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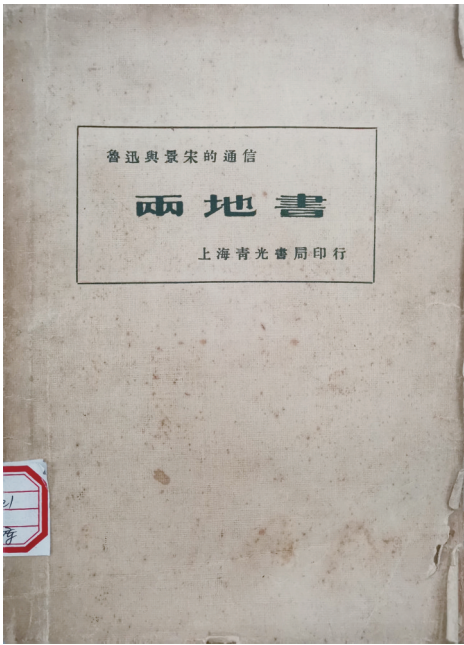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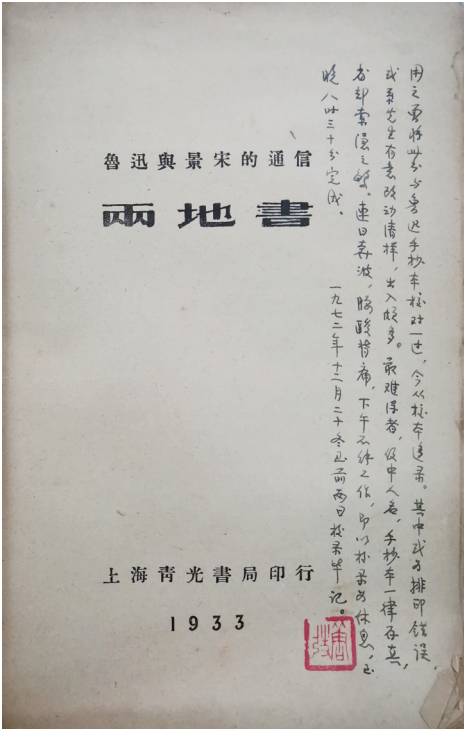
唐弢的书话写作,是现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创新。20世纪40年代起,他在《万象》《文汇报》等报刊发表书话,将版本考据、文本分析与散文笔法熔于一炉,开创了“史料性书话”的新范式。这一文体在《两地书》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,既考证了《两地书》从手稿到定本的修改细节,又以“美丽的散文”评析鲁迅的情感表达与思想演进。

在《晦庵书话》中,唐弢提出书话应兼具“一点事实、一点掌故、一点观点、一点抒情”的特色。这一理念在《两地书》相关篇章中尤为突出,如他对比鲁迅原信中“枭蛇鬼怪”的自我指涉与修订后的“对头”一词,指出前者更贴近鲁迅“反抗绝望”的精神内核。此类分析不仅揭示了文本的修辞策略,更将《两地书》置于新文化运动与革命文学的张力中,凸显其作为“情感启蒙”与“思想转型”双重标本的意义。

唐弢的书话对现代文学史编纂影响深远。进入新时期,他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跳出“文艺运动史”框架,强调以社团、流派、版本为基础的史书写作。这一思路直接源于其书话实践:通过对《两地书》等经典文本的微观考辨,他重新梳理了“文学史本身的发展脉络”,如书中将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视为“新文学隐私文化的典型案例”,这一观点显然受其书话中“书信与现代中国情感结构”论述的启发。

唐弢对《两地书》的校勘与研究,是其藏书体系、鲁迅交往与书话文体的交汇点。他以文献实证为基础,以精神对话为方法,以文体创新为表达,构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立体范式。这一范式不仅校正了《两地书》的文本讹误,更开拓了鲁迅研究的路径,从“神化”到“人化”,从“主义”到“细节”,从“公共叙事”到“私人经验”。在当代学术语境下,唐弢的实践提示我们,文学史的重构既需立足于史料的深耕,也需要研究者对文本的温情与洞察。装帧是内容的仪表,而历史的真相,往往藏于字句的褶皱之间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现代文学馆)



唐弢藏书《两地书》初版
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藏

图片报道



7月16日,“不止于白——中国德化白瓷展”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。展览精选90余件(套)德化陶瓷精品,涵盖古代艺术珍品、当代名家力作及清华大学与德化县校地合作的创新成果。从明代“中国白”瓷雕到融入现代设计语言的创意作品,每件展品都诉说着德化瓷的千年传承。

“不止于白”既回应了“中国白”的美誉,亦尝试以新视角打破人们对德化白瓷的单一认知,通过造型突破和功能拓展,展现其“以白见长”但“不止于白”的多元艺术维度,实现对德化陶瓷多重面貌与精神内核的重新审视。

肖非 摄